

杜甫詩史、敘事傳統與《春秋》書法

張高評

提 要

杜甫三十歲時，曾作《祭遠祖當陽君文》，稱遠祖杜預：“《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當下許諾“不敢忘本，不敢違仁”。晚唐孟棻（啟）《本事詩》稱杜甫逢安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春秋》推見至隱”，可見杜甫詩號為詩史者，除了“詩是吾家事”之外，其中自有《春秋》書法之薪傳在焉。清章學誠《上大司馬論文》稱：“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今選擇杜甫詩敘事歌行，關注其善陳時事之特質，持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考察其中推見至隱之書法，就杜甫詩史與屬辭比事之敘事傳統，分三項考察之：一，屬辭比事，筆削顯義；二，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三，微婉顯晦，推見至隱。援舉杜詩相關作品，參考清人杜詩說解，藉以探索杜甫詩之敘事傳統。夫然後知抒情傳統之外，敘事傳統也者，尤為中國文學源遠流長之重要特色。

關鍵詞：杜甫詩史 比事屬辭 敘事傳統 《春秋》書法 抒情傳統

稱杜甫詩為“詩史”，首見於晚唐孟棻（啟）《本事詩》。至宋代，學習杜詩、宗法杜詩之風盛行；加以《春秋》學復興，史學空前繁榮，於是詩話、筆記、序跋、文集持“詩史”論述杜甫詩者，十分繁夥。宋代詩話筆記所論“詩史”，涉及層面

大概有三：詩補史闕、褒貶資鑑、史筆森嚴。¹“杜工部似司馬遷”之命題，則又涵蓋“於序事中寓論斷”之傾向。²要之，多可供參考觸發。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當循其本初，覆按孟棻(啟)《本事詩》之論述。當有助於推尋“詩史”之原始：

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³

據此看來，遭逢安史之亂，為杜甫詩史之創作背景與時間；流離隴蜀，則為詩史創作之空間與處境；“推見至隱”四字，則為詩史體現世局離亂之表現手法。其中，“推見至隱”四字，最為理解詩史之關鍵術語。《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⁴可見“推見至隱”為《春秋》書法之一，亦即《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五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之曲筆諱書。⁵南宋楊萬里《誠齋詩話》曾引述《春秋》五例，以論證“《詩》與《春秋》紀事之妙”(詳下)。錢鍾書《管錐編》，亦據“微婉顯晦”之《春秋》書法，闡發“《春秋》書法遂成史家楷模”，“言史筆幾與言詩筆莫辯”。⁶由此觀之，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關係之密切，可以想見。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稱：“《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

-
- 1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頁160—166。
 - 2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頁185—194。參考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429；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80—107。
 - 3 孟啟：《本事詩·高逸第三》，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5。
 - 4 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頁1264。
 - 5 張高評：《文章修辭與〈春秋〉書法》，《中國經學》第19輯(2016年10月)，頁29、30。又，張高評：《〈春秋〉曲筆書滅與〈左傳〉屬辭比事》《成大中文學報》第45期(2014年6月)，頁18~19。
 - 6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頁164。

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⁷ 揭示了《左傳》以先經、後經、依經、錯經之歷史敘事，詮釋孔子《春秋》經。杜甫新樂府之“詩史”敘事，紹述其祖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歷史敘事，薪傳《左傳》揭示之“《春秋》五例”，發揚孔子《春秋》藉其事、憑其文，以寓寄微辭隱義之書法義法。於是所謂“詩史”也者，既有史法，書法，更寓含比興寄託之詩法。

一、杜甫詩史、《春秋》書法、樂府敘事與中國文學傳統

(一) 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

杜甫所作詩歌，何以稱為“詩史”？就“詩”而言，杜甫曾言：“詩是吾家事”，⁸ 蓋薪傳自祖父杜審言，作詩乃杜氏之家學淵源，此毋庸置疑。若考察“詩史”之“史”字，如之何與《春秋》書法有所聯結？則檢閱杜甫三十歲時所作《祭遠祖當陽君文》，自可明白：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恭聞淵深，罕得窺測。……《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靜思骨肉，悲憤心胸。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⁹

當陽君、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即是杜預。以文武全才，無所不有，當時號為“杜武庫”，為杜甫十三世之先祖遠祖。杜預自稱有《左傳》癖，著作《春秋經傳集解》，以章句訓詁注解《春秋》與《左傳》，後世稱揚杜預為《左傳》之功臣。又著有《春秋釋例》，發明《春秋》義例獨多。¹⁰ 杜甫身為杜預第十三世孫，於《祭

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經傳集解》卷首《春秋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11，總頁11。

8 杜甫撰，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477。

9 杜甫撰，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2216—2217。

10 《晉書·杜預傳》，參考葉政欣：《杜預及其春秋左氏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方韜：《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文》中先推崇“《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復感歎筆跡流宕，悲憤心胸；文末宣言“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由此觀之，除了“詩是吾家事”之外，《春秋》書法、史家筆法之紹述與發揚，當是杜甫克紹箕裘、報本還始、落實體現、當仁不讓之自我期許。清劉鳳誥《杜工部詩話》卷一，論證杜甫《祭文》之“《春秋》主解，稿隸躬親”，舉例申明杜詩遣詞隸事，多採用《春秋左氏傳》，如《懷李白》、《兵車行》、《前出塞》、《投贈哥舒開府》諸什，多運化《左傳》事語。杜甫作詩，宗法《春秋左氏傳》，肯堂肯構如此，“洵為克承家學者矣”！¹¹

杜甫“詩史”，固然與《左傳》之史家敘事筆法有關；夷考其實，尤其與“推見至隱”諸《春秋》書法關係密切。何以言然？左丘明以歷史敘事解釋孔子《春秋》經，除了杜預《春秋序》所謂先經、後經、依經、錯經之外，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揭示《春秋》五例，前四例涉及曲筆與直書之文章修辭；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提倡“《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以及杜預於《春秋經傳集解》發明《左傳》之凡例義例，多有助於解讀《春秋》經。杜甫所作敘事歌行，詩法往往暗合《春秋》書法，觀宋、明學者品評杜甫《哀江頭》，可以知其然：

《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費數百言而後成歌，杜公言太真之被寵，則“昭陽殿裏第一人”足矣。言富貴，則“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足矣。言馬嵬之死，則“血污遊魂歸不得”足矣。¹²

善述事者，但舉一事，而衆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於言外。若纖悉備記，文愈繁而味愈短矣。¹³

舉一概餘，以偏概全之敘事法，正是《春秋》書法之衍化。《穀梁傳》解《春

11 張忠綱：《杜甫詩話六種校注》（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劉鳳誥《杜工部詩話》卷一，頁265。

12 杜甫著，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178。

13 黃生著，徐定祥點校：《杜詩說》卷三，頁87。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332。

秋》經，有舉重、舉輕之說，錢鍾書《管錐編》闡發之：《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以爲“草輕而菽重，舉不殺草”，則霜不殺菽可知。定公元年：“隕霜殺菽”，以爲舉“殺菽”，則霜亦殺草可知。¹⁴《春秋》書法，或舉重以明輕，或舉輕以明重，無論《穀梁傳》、《公羊傳》，其例繁夥，不贅。¹⁵ 除外，《春秋》書法又有舉大以該細，即細以見大者。¹⁶ 如杜詩《冬狩行》，“言殺獲之多，舉大以該小。言追逐之廣，舉小以該大”，¹⁷ 是其例也。《春秋》書法，又有常事不書，非常、違禮乃書者，故隱公四年《春秋》書“衛人立晉”，《公羊傳》以爲：“立者，不宜立也”；以之觀察杜詩《洗兵馬》、《留花門》諸詩，樂府新題之正言若反，反言顯正，亦有《春秋》書法之風味。

司馬遷私淑孔子，典範《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謂，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¹⁸《孟子·離婁下》稱孔子作《春秋》，包含其事、其文、其義三元素；《禮記·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¹⁹ 就比較而言，約其辭文，即是其文、屬辭之功夫；去其煩重，乃其事、比事之安排。統其事、其文而一之，自是“法”之表現。掌握其事、其文之史法或書法，而言外之義，事外之旨，作者著述之苦心孤詣，別識心裁，可以即器求道，藉形傳神。清章學誠《上朱大司馬論文》云：“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原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信摭》亦稱：“史家敘述之文，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²⁰ 可見，敘事藝術、史家筆法、《春秋》書法，多從“比事屬辭”之《春秋》教奪胎衍化而來。杜甫詩史之解讀，無論敘事、史學，或《春秋》書法，多與“屬辭比事”之《春秋》

14 錢鍾書：《管錐編》，冊三，頁 967。

15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 年），頁 524—527。參考王熙元：《穀梁范注發微》（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2 年），頁 578—583。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七章“詳略”、“輕重”，頁 221—223。

16 方苞：《周官析疑序》，參考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第七章《〈周官析疑〉、〈周官集注〉與屬辭比事》，頁 322—325。

17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1056。

18 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一四，頁 6，總頁 235。

19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經解》，頁 1，總頁 845。

20 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 年），頁 308。

教息息相關。

(二) 樂府敘事歌行與中國文學傳統

中國文學有兩大傳統，一為抒情傳統，一為敘事傳統。抒情傳統，自旅美學人陳世驥提倡以來，²¹中經高友工、王德威諸教授之推拓，²²沸沸揚揚，已探討近五十年。其中是非得失，姑且不論。²³然與抒情傳統並駕齊驅之敘事傳統，一直未受學界應有之關注。研究熱度與深度，一直停滯不前。間有引進西方敘事學觀點，以解讀中國傳統敘事文學者，祇可稱為比較論述。探討對象縱然為傳統敘事文本，然運用之方法卻疏離中國敘事傳統。²⁴果真如此，自不宜稱為敘事傳統。

所謂“傳統”，指發生於過去，但卻始終作用於現當代。中國敘事傳統，發源於《春秋》，拓展於《左傳》，成熟於《史記》。《春秋》屬辭比事，為傳統敘事學之濫觴；《左傳》以史傳經，為歷史敘事之典範；《史記》善序事理，為敘事文學之開山。²⁵《史》《漢》以降之史傳文學、樂府敘事、小說、戲劇，要皆脫化於屬辭比事之《春秋》書法。杜甫作於安史之亂前後之樂府歌行，大多富含傳統敘事學

21 陳世驥：《陳世驥文存》（臺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中國的抒情傳統》結語：“所有的文學傳統，‘統統是’抒情詩的傳統。”頁31—37。

22 參考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陳國球、王德威：《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顏崑陽：《從反思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建構以論“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聚狀結構》，《東華漢學》第9期（2009年6月），頁1—47；龔鵬程：《成體系的戲論：論高友工的抒情傳統》，《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155—190。張伯偉：《中國文學批評的抒情性傳統》，《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

23 如龔鵬程之說，以為：“高友工是陳世驥之後最重要的抒情論者，其‘抒情美典’相關論述，影響甚大。但高氏雖反覆說抒情，可是對中國文化中‘心、性、情、氣、志、意、才、理’之間的複雜關係，並無辨析疏理，僅以抒情一辭籠統言之”。“是以其所構造的抒情傳統論，雖體系儼然，自足自適，但用在中國文學的解釋上，卻是一套戲論。”龔鵬程：《成體系的戲論：論高友工的抒情傳統》，《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155—190。

24 如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此書影響臺灣學界敘事學之論述甚鉅，史傳、小說之詮釋，皆得其啟發。董乃斌編：《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董乃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論稿》，（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

25 張高評：《〈春秋〉〈左傳〉〈史記〉與敘事傳統》，《國文天地》第33卷第5期（總第389期，2017年10月），頁16—24。

之特質，要皆為史家筆法、《春秋》書法之體現。孟棻(啟)《本事詩》所謂“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宋代詩話筆記所謂“微婉顯晦”之《春秋》書法，所謂“杜工部似司馬遷”之史家筆法，此中有之。經由《春秋》書法、史家筆法之運化表現，敘事傳統與抒情傳統已不疑而具。抑有進者，中國文學之兩大傳統，於世所稱杜甫詩史，安史之亂前後所作樂府敘事歌行，多燦然具備，且彼此交融，相互爭輝。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述樂府詩之緣起，謂“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有敘事、有抒情，交相映發。又稱：“可以觀風俗，知薄厚”，²⁶則敘事之成敗，傳人之功過毀譽可知。王運熙以為：樂府詩體，最便於反映現實生活。其中新題樂府，採用樂府體式，自制新題，此即元稹《樂府古題序》所謂“即事名篇，無復倚傍”；杜甫、元稹、白居易所作新樂府辭，即是個中代表。宋蔡啟《蔡寬夫詩話》稱老杜《兵車行》、《悲青阪》、《無家別》諸篇，“皆因時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²⁷所謂“自出己意立題”，針對杜甫敘事歌行之樂府新題，自是點睛之論。明張綖《杜詩通》稱杜甫“別出一格，用古體寫今事，大家機杼，不主故常，昔人稱詩史者以此”。²⁸不主故常、別出一格，用古體寫今事，即是杜甫新題樂府之關鍵詞。清黃生《杜詩說》稱杜甫“《新婚別》諸篇，自制詩題，便有千古自命意”，²⁹即指新題樂府敘事歌行而言。漢樂府長於描寫下層社會與人民苦痛，杜甫所作新題樂府，多所承繼與體現。³⁰

羅宗強則指出：“以時事入詩，是杜甫的一大創造”，“杜甫無疑開創了寫時事的傳統”。又稱：“杜甫把寫實與抒情，天衣無縫的結合起來，融為一體。”³¹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史批評史》亦以為：杜甫詩“一貫重視運用樂府詩體裁，來反映政治社會現實和人民的痛苦，往往寫得形象鮮明生動，感情飽滿強

26 班固著，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卷三十（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59，總頁903。

27 蔡啟：《蔡寬夫詩話》，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本，卷下，頁3。

28 杜甫撰，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126。

29 黃生著，徐定祥點校：《杜詩說》（合肥：黃山書社，1984年），頁29。

30 王運熙：《望海樓筆記》（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37、190。

31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07—109。

烈。”³²觀此可知，樂府歌行，實乃敘事傳統之流亞；乃敘事傳統與抒情傳統之融合爭輝。《史記》發憤著述，近似“無韻之《離騷》”；³³杜甫於安史之亂前後所作新題樂府歌行，恰好光大此一文學之敘事傳統。

二、杜甫詩史與“屬辭比事”之敘事傳統

屬辭比事，為詮釋《春秋》書法之要領，亦解讀中國傳統敘事學之鎖鑰。宋人所作詩話、筆記，常持《春秋》書法作為準繩，以評騭唐詩作品之優劣，軒輊唐代詩人之高下。尤以歌詠唐明皇楊貴妃愛情，安史之亂始末為然。

蔡條《西清詩話》，以“《春秋》書正月意”，解讀杜甫《人日》詩。張戒《歲寒堂詩話》，標榜微婉顯晦，以品題《哀江頭》，以為“詩與《春秋》相表裏”。黃徹《碧溪詩話》，考察《北征》詩，以為仿《春秋》“王正月”書法；杜詩涉及里居、名字、補官、遷徙，要皆“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劉克莊《後村詩話》，以為杜甫敘寫陳濤、潼關之敗，“直筆不恕”。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品論《北征》詩，以為切合“微而顯”之《春秋》書法。洪邁《容齋隨筆》，枚舉杜甫“直辭詠寄，略無避隱”之詩，如《兵車行》、《（前後）出塞》、《三吏》、《三別》、《哀王孫》、《麗人行》諸什以為證。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錄存王深父評杜甫即事命篇之樂府歌行，多以美刺褒貶論斷杜甫“詩史”。筆者曾撰《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一文，³⁴已略言梗概，茲不再贅述。

（一）屬辭比事，筆削顯義

杜詩學之研究，至清代諸家爭鳴，多有所得。清乾隆御纂《唐宋詩醇》，品評杜甫《北征》詩，特提“行屬辭比事之法”。此一提示，於詩史研究、樂府敘事

³² 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史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63。

³³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308。參考吳汝煜：《史記論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34—42。張新科：《史記與中國文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62—170。

³⁴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322—329、337—344、347—349、356—359。

歌行之探討，頗有畫龍點睛之啟示作用。其言曰：

（杜甫）以排天幹地之力，行屬辭比事之法，具備方物，橫絕太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以來，不得不以此為大文字也。³⁵

《唐宋詩醇》直指杜甫《北征》詩：“行屬辭比事之法”，無異宣稱《北征》詩實乃杜甫運化《春秋》書法之傑作。考察“屬辭比事”之法，乃孔子筆削魯史記，作成《春秋》之歷史編纂學。其法，以義為主腦、為將帥，進而選擇取捨素材，體現出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重或輕之書法來。事有主從、大小，故行屬辭比事之法，而有詳略、重輕、斷續、正反、前後之斟酌取捨。³⁶ 要之，屬辭之方，或比事之法，至《左氏》傳《春秋》，出以歷史敘事，逐漸衍化為詳略、重輕、正反、前後、序列之敘事藝術，此皆《春秋》藉由或筆或削之取捨，以見微辭隱義之方法。試以《北征》詩為例：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過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潑。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帶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廊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

35 乾隆：《御選唐宋詩醇》，《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7。參考清郭曾忻：《讀杜劄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70。

36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頁332—364；頁395—438。

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衽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³⁷

運行屬辭比事之法，作爲敘事歌行、杜甫詩史，最少必須經由三道程序：其一，史事經由或筆或削，或取或捨之斟酌。其二，事之編比，體現爲主從、我他、詳略、重輕、異同之精心安排；辭之連屬，表現爲斷續、顯晦、曲直、虛實、繁簡、正反、前後之巧妙剪裁。其三，曲終奏雅，卒章顯志，點醒敘事之旨趣，凸出詩人之指義。清沈德潛《說詩啐語》品評杜甫五古長篇：“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³⁸斷續、旁插、轉接法之運用，清方苞論義法，有所謂“義以爲經，而法緯之”者，³⁹即此是也。蓋意在筆先，以意運法，往往能脈注綺交，轉接無象。語雖不接而意脈相接，如橫雲斷嶺之奇，《春秋》如此作成，杜甫敘事歌行，自亦如此運作與表現。

宋范溫《潛溪詩眼》，載黃庭堅論杜甫《北征》詩曰：“若論工巧，《北征》不

37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395。

38 沈德潛：《說詩啐語》，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頁534。

39 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二，《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19，總頁40。

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⁴⁰ 杜甫敘寫安史之亂前後，身經目歷，現身說法之歷史，是所謂“書一代之事”，是即孟啟《本事詩》所云之詩史。《北征》詩才六百言，而能“書一代之事”；猶孔子作《春秋》，才一萬六千餘言，卻書寫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筆削之講求，史事之選取，辭文之修飾，必期於謹嚴而有法度。否則，將難以企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今持以視杜甫作《北征》詩，“書一代之事”，何嘗不是“約其辭文，去其煩重”，杜詩與《春秋》之書寫，當有異曲同工之妙。

歷代詩話、杜詩專著，究竟如何評賞《北征》詩？綜合而觀，殊途同歸，大抵指向屬辭與比事之敘事書法體現。如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清楊倫《杜詩鏡銓》所言：

長篇最難……至杜子美《北征》、《述懷》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也。⁴¹

首敘辭朝戀主之情，即總伏一篇意。……末復追述初亂，終以開創之大業屬望中興。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結，是始末大章法。⁴²

宋范溫《潛溪詩眼》稱杜甫《北征》諸長篇“如太史公紀傳”；清沈德潛《說詩晬語》評論杜甫五古長篇，“運《左》《史》法於韻語中”；先後點出杜甫敘事歌行與敘事傳統之源流關係。“爰始要終，本末悉昭”，為古《春秋》紀事之成法；⁴³ 故《春秋》、《左傳》、《史記》之歷史敘事傳承之，遂成傳統敘事學之重要方法。清楊倫《杜詩鏡銓》評《北征》詩，分析“首敘”、“末述”、“終以”之結構，且謂“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結，是始末大章法”。此固近《史記》“見始終之變，知存

40 范溫：《潛溪詩眼》，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年），頁402—403。

41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411。

42 杜甫撰，楊倫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64、166。

43 劉師培：《古春秋記事成法攷》，《劉申叔先生遺書》冊三，《左龔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卷二，頁1445。

亡之機”；⁴⁴推而上之，更切合《春秋》、《左傳》敘事張本繼末，原始要終之要領。⁴⁵ 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表現之層面有三：比事見義，屬辭示義以及比屬觀義。⁴⁶ 其中，合比事與屬辭而觀義，乃清代章學誠所謂“事具始末，文成規矩”之敘事法。⁴⁷ 來龍去脈井然，敘事見終始本末，此杜甫《北征》有得於傳統敘事學者。

何謂比事見義？大抵指類比、對比相關史事，以見作者之孤懷獨斷、別識心裁者。就《春秋》學觀之，諸家說屬辭，多兼含比事而言之，如元趙汭《春秋屬辭》，清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是。清代孔廣森《公羊通義》云：“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⁴⁸晚清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亦云：“聖經書法，必聯屬其辭，排比其事，而（其義）乃明。”⁴⁹ 中唐啖助、趙匡等倡“《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既捨傳矣，又如何考求經旨？上文所述張本繼末，探究終始，自是其中一法；梳理敘事，以排比事跡見義，又是一法。⁵⁰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評《北征》詩，可作杜甫詩比事見義之例證：

大約“菊垂”以下，皆邠土風物，此屬佳景；“坡陀”以下，乃鄜州風物，此屬慘景。周甸注：“途中所歷，有可傷者，有可畏者，有可喜者，有可痛者。”……“襁褓”以上，乍見而悲，極夫妻兒女至情。“老夫”而下，悲過而喜，盡室家曲折之狀。……此章大旨，以前二節為提綱，首節北征問

44 周一平：《司馬遷史學批評及其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引《屈原賈生列傳》，頁27—29。

45 張高評：《〈左傳〉敘事見本末與〈春秋〉書法》，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史重探(1)——中世紀以前文獻的再探討”，第二次學術研討會論文，2018年7月19日，頁1—28。

46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年），頁28—34。

47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70。

48 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孔檢討公羊通義》，（臺北：復興書局，1961年），學海堂《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一，頁7，總頁9293。

49 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首《凡例》，頁6。

50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義”在言外——比事見義與〈春秋〉學史研究》，《文與哲》第25期（2014年12月），頁77—130。

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節恐君遺失，乃意中事，伏五、六、七段。⁵¹

其事、其文、其義，為傳統敘事學的三大頂梁柱。方苞說《左傳》《史記》敘事義法，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可以推拓至其他傳統敘事。簡言之，義為先，法在後，世所謂胸有成竹，所謂未下筆先有意，即此之謂。詩人纂組篇章，敘述事態，與史家排比史事，敘說歷史，其中之筆削去取，重輕詳略，並無不同。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說杜甫《北征》詩，稱“此章大旨，以前二節為提綱”，首節“北征問家”，次節“恐君遺失”，一為身上事，一為意中事。此二義，貫通全詩。此就《左傳》之歷史敘事而言，長篇多於篇首提挈綱領，可以駕浩瀚而御繁瑣，如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首揭“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篇首亦揭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⁵²《史記·魏公子列傳》特揭魏公子“仁而好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此之謂“提敘”。杜甫《北征》，敘途中之身經目歷，歸家之悲喜情懷；場景之選用安排，悲喜苦樂之次第書寫，要皆與歷史敘事之比事見義暗合。邠土風物之佳景，與鄜州風物之慘景，安排對比映襯，諷諭自在言外。即途中經歷言，排比可傷、可畏、可喜、可痛苦諸場景，而安史之亂前後之史事，宛在目前。第四段，重敘、詳敘收京闕、搗賊巢之殷望；第五段，以頌聖斷、卜中興為主調。⁵³ 要之，亦多吻合統一原則，選用相關景象，類比顯義，可以考見詩人之胸襟與抱負。要之，多可與比事見義之《春秋》教相發明。

杜甫所作樂府敘事歌行，多“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論其“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之詩篇，當數作於成都西郊之《草堂》詩，堪稱“書一代之事，具一代之興亡”之詩史。《草堂》詩云：

51 杜甫撰，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397、400、405。

52 張高評：修訂重版《左傳之文學價值·張高評解析經史二》（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年），頁238～239。

53 杜甫著，浦起龍釋：《讀杜心解》（臺北：中央興地出版社，1970），頁42。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西卒卻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逾。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柵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⁵⁴

此詩之創作背景，所謂草堂去來者，清錢謙益《錢注杜詩》歷史考證極爲明白：“寶應元年(762年)四月，嚴武入朝。七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誅。公攜家避亂往梓州。廣德二年(764年)，武鎮劍南，公復還成都草堂。”⁵⁵清楊倫《杜詩鏡銓》評杜甫《草堂》詩：“以成都治亂，爲草堂去來，四句領起全意”；且稱：“以草堂去來爲主，而敘西川一時寇亂情形，並帶入天下，鋪陳終始，暢極淋漓，豈非詩史？”⁵⁶清黃生《杜詩說》亦以爲：“起四句，略敘去來之故，爲詩之綱；以後分兩段細敘，爲詩之目。”⁵⁷由錢謙益之說，知杜甫草堂去來之本事。自楊倫、黃生之說觀之，杜甫《草堂》詩之敘成都治亂，可目爲“詩史”者，起首亦採《左傳》《史記》慣用之提敘法。起首將一篇大旨提明，而後敘事有法，言之有序。

唐劉知幾《史通·載言》稱《左傳》敘事之特色，推崇爲“言之與事，同在

54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1112。

55 杜甫著，錢謙益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1979年），頁162。

56 杜甫著，楊倫注：《杜詩鏡銓》，頁514、516。

57 黃生撰，徐定祥點校：《杜詩說》，頁59。

《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⁵⁸於是乎敘事記言，同在一傳之中；“言事相兼，煩省合理”，遂成《左傳》以下，包含《史記》等史傳文學之敘事策略。《史通·敘事》論敘事之體有四，除了直紀其才行，唯書其事迹之外，敘事中安排對話，即是“因言語而可知”之言敘法、語敘法。⁵⁹《左傳》、《史記》諸史傳敘事之妙者，多出以藉言記事。無論擬言、代言，要皆疊疊有味，令人覽諷忘疲。杜甫作詩，薪傳十三世祖杜預之《春秋左傳》家學，故敘寫安史之亂前後之史事，敘事中多摻雜記言，或設為問答，如《兵車行》、《哀王孫》、《新安吏》、《潼關吏》、《新婚別》諸什。文情活潑，語言生動，誠如諸家之評論：

（《兵車行》）首段，敘送別悲楚之狀，乃紀事；下二段，述征夫苦役之情，乃記言。次提過者行人，設為問答，而以“君不聞”數語作收應。⁶⁰

（《哀王孫》）次段敘事，記當時避亂隱身之迹。……“問之”四句，備寫痛苦之詞，並狼狽之狀。……末二語，又反覆以致其叮嚀，曰慎勿疏，戒之也。⁶¹

58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34。

59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六，頁168。

60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二《兵車行》：“車轡轡，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孀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頁113~114。

61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哀王孫》：“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實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隴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賢德北服南單于。花門斃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頁310。

(《新安吏》)從點兵後,記一時間答之詞。⁶²

(《潼關吏》)“修關”一句,公問詞。“連雲”以下,吏答詞。⁶³

(《新婚別》)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為問答,此《三吏》、《三別》諸篇所自來也。⁶⁴

敘事文學而穿插對話,不但言事相兼,煩省合理,而且能化場景為真實之舞臺,變人物為活生之演員,最能聳動聲情,浮現意象。筆者以為:敘事兼含記言,問對之功能有四:一曰刻劃個性,表現情懷;二曰推動情節,逆料未來;三曰展示場景,省卻解說;四曰交代枝節,統攝微瑣。⁶⁵ 錢鍾書《管錐編》稱,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且指出《左傳》之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遽過也。”⁶⁶《春秋左氏傳》於杜甫,因十三世祖杜預之“《左傳》癖”而成家學。故杜甫以敘事歌體,創作《三吏》、《三別》,以及《兵車行》、《哀王孫》諸新樂府詩,對《左傳》家學之傳承發揚,果然肯堂肯構,克紹箕裘。尤其《三吏》、《三別》之問答,《杜詩詳注》以為淵源於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筆者則以為:若推而上之,當根源於《左傳》之語言交際與應對。

至於《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之擬言代言,仇兆鰲《杜詩詳注》已稍作提示,如:

(《石壕吏》)二段,備述老婦訴吏之詞。陸時雍曰:“吏呼”二語,便當數十言。⁶⁷

62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23。

63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26。

64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33。

65 張高評:修訂重版《左傳之文學價值·張高評解析經史二》,(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頁 261。

66 錢鍾書:《管錐編》,頁 166。參考張高評《〈管錐編〉論〈左傳〉之敘事與記言——錢鍾書之〈左傳〉學》,《國學研究》第 15 卷(2005 年 6 月),頁 351~384。

67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29。

(《新婚別》)王嗣奭曰：此代為婦人語，而揣摩以發其隱情。

(《垂老別》)通篇皆作老人語，首為垂老從戎而歎也。⁶⁸

(《無家別》)通章代為征人之語。⁶⁹

杜甫敘事短章，完整具足，猶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亦猶山水圖繪，尺幅而有千里之勢。《石壕吏》之老婦，《新婚別》之新婦，《垂老別》之老人，《無家別》之征人，杜甫作詩，多出於擬言代言，能設身處地，忖度揣摩之，故聲情妙肖如此，其苦況慘狀遂如聞如見，令讀者有實臨之感受。誠如明末王嗣奭《杜臆》所云：“一一刻劃宛然，同工異曲，隨物賦形，真造化手也。”⁷⁰《左傳》長於擬言代言，杜甫敘事歌行亦工於此法。妙於問對，前後一揆如此，是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所謂“不敢忘本，不敢違仁”者歟！

《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體現為史事之排比，辭文之連屬。史事之編比，又因主從、我他、大小，而有詳略、重輕、偏全之依違取捨。而辭文之連屬，亦由此而有繁約、顯晦、曲直、疏密、案斷，乃至於擬言、代言諸修辭手法。指義之所在，大凡主體、我者、大者，敘事之筆法多較詳、較重、偏曲；若為客體、他者、小焉者，則往往較略、較輕、偏直。主與賓之定位，與詳略、重輕之書法多息息相關。而屬辭、修辭之講求，亦與此消息。換言之，或筆或削之書法，即逐漸衍化為詳略、重輕、顯晦、曲直、終始、本末之義法，以及敘事、記言之書法。杜甫所作詩史，安史之亂前後所作新題樂府敘事歌行有之。

(二) 據事直書，美惡自見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徵引《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闡發《春秋》書法，有所謂“為例之情有五”者，其四云：

68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34。

69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37。

70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39。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⁷¹

直書與曲筆，書法不同。事有曲直，人有是非，敘事傳人，如實呈現，所謂不隱不諱，直書其事，此之謂直書。蓋事外無理，理在事中；因此，不勞解釋，無庸說明，是非美惡、功過得失，自見於言外。可作信史，堪稱實錄。杜甫長於敘事，書寫安史之亂前後身經目歷之時事，年月、地理、本末曉然，信而有徵，多可據依，故宋陳巖肖《庚溪詩話》、蔡條《西清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姚寬《西溪叢話》，率稱為“詩史”，以為杜詩敘事足補唐史之闕漏。南宋洪邁《容齋續筆》“唐詩無避諱”條，援引大量杜甫所作新樂府敘事歌行，以論證“直辭詠寄，略無避隱”之《春秋》書法傳統，於杜甫詩史，頗有薪傳與發揚，如云：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今之詩人不敢爾也。⁷²

就素材之取捨選用而言，“直書其事，具文見義”，杜甫敘事歌行所謂詩史者極多。洪邁《容齋續筆》所列杜甫詩，《三吏》、《三別》之外，《前出塞》、《後出塞》、《兵車行》、《哀王孫》、《哀江頭》、《麗人行》、《悲陳陶》⁷³、《觀公孫大娘舞

71 左丘明著，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孔穎達《疏》云：“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首，頁17，總頁14。

72 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236—237。

73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悲陳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北向啼，日夜更望官軍至。”頁314。

劍器行》⁷⁴諸什，所謂“直辭詠寄，略無避諱”者，率皆為新題樂府敘事歌行。《朱子語類》卷八十三《春秋·綱領》，載朱熹說《春秋》之語錄，如云：“《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又曰：“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又謂：“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云云。⁷⁵朱熹據實直書之《春秋》觀，與其徵實精神密切相關。⁷⁶杜甫敘事歌行之“直辭詠寄”，固然為歷史敘事書法之一，且為上承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所謂“盡而不汙”之直書傳統，亦由此可見。

宋人所作序跋、詩話、筆記，對於“杜工部似司馬遷”之議題，甚感興趣。嘗試考之，杜詩與《史記》相似處，據事直書，以敘為議為多。⁷⁷試觀宋代詩話、筆記，對於杜甫詩歌與直書、實錄之關連，頗多著墨，可以知之。如：

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概見事跡，比《新(唐)書》列傳，彼為踳駁。⁷⁸

(子美)《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吏》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⁷⁹

宋王洙稱杜甫詩“概見事跡”，可以媲美唐實錄，了無《新唐書》踳駁之病。

74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二十《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唇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煙，女樂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前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躡荒山轉愁疾。”頁 1815 ~ 1818。

75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八三（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頁 2144—2146。

76 張高評：《朱熹之〈春秋〉觀——據實直書與朱子之徵實精神》，《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 年），頁 353—390。

77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伍、三、（五）《杜工部似司馬遷·以敘為議》，頁 191 ~ 192。

78 王洙：《杜工部集序》，杜甫撰，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附編，頁 2240。

79 劉克莊著，王秀梅點校：《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後集卷二，頁 59。

杜甫與房琯相善，《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詩，⁸⁰頗稱許哥舒翰。然房琯兵敗陳陶斜，杜甫作《悲陳陶》詩，傷主帥之輕敵；哥舒翰軍敗潼關，杜甫作《潼關吏》，囑咐防關將：“慎勿學哥舒”，遂致疑於學者，以為後詩似與杜甫素論相反。劉克莊駁斥之，以為並非相反不一，且推許杜甫所作二詩“直筆不少恕”。唯直筆不恕，是以贏得“詩史”之佳譽。

明清學者解讀杜甫敘事歌行，揭示其直書、實錄者亦不少。如對《前出塞》、《後出塞》、《哀王孫》、《哀江頭》、《三吏》、《三別》諸詩之品評，可窺一斑。如明黃生《杜詩說》：

前後《出塞》，皆諷明皇躡武之事。交河之役以遣戍，故其辭怨；薊門之役以召募，故其辭誇。然兩番雖靜，祿山繼反，是徒搜狐兔之穴，而不知虎狼之在門內也。詩但具其事，而諷刺之意自見於言外，此真樂府正音，固不在區區字節句比耳。⁸¹

黃生評杜甫前後《出塞》，以為“但具其事，而諷刺之意自見於言外”，此朱熹論《春秋》，所謂“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晉杜預《春秋序》所標榜之直書精神，杜甫確定落實“不敢忘本，不敢違仁”之《祭文》承諾。於“詩是吾家事”之外，於《春秋》《左傳》果能克紹箕裘矣！又如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品評《哀王孫》、《哀江頭》：

開元之際，幾於貞觀盛世。及天寶末，不唯生民塗炭，而妻子亦且不免。

80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三《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製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勛業青冥上，交親氣概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頁 188 ~ 192。

81 黃生：《杜詩說》卷一，頁 26。

讀《江頭》、《王孫》二詩，至今猶慘然在目。⁸²

曲江頭，乃帝與貴妃平日遊幸之所，故有宮殿。公追遯亂根，自貴妃始。

故此詩直述其寵幸宴遊，而終之以血污遊魂，深刺之，以為後鑒也。⁸³

杜甫於安史之亂，身經目歷，體會深刻。故《哀王孫》詩據事直書，多可徵信。王室之倉皇逃難、兩京之淪陷不復，王孫之顛沛狼狽，明皇之傳位肅宗，皆一一敘記之，所謂“書一代之事”也。故讀杜詩，可以知世變。《哀江頭》詩，首先追敘貴妃遊苑事，極言盛時之樂；其次，感慨馬嵬西狩事，深致亂後之悲。天寶之亂，楊妃實為禍階，自見於言外。清顧炎武《日知錄》稱：“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⁸⁴筆者以為，於敘事中寓論斷，不唯司馬遷能之，左丘明傳《左氏》，亦優為之，此自是歷史敘事傳統中，“比事見義”之法門，晚清皮錫瑞所謂“藉事明義”之法。⁸⁵杜甫敘事歌行，亦唯書事迹，排比真相而已，不作論斷與抑揚。雖然，而論斷抑揚自見於言外。試與《舊唐書》、《唐鑑》、《明皇雜錄》諸史著對讀，乃知杜甫詩史誠然“書一代之事”。

如《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詩，⁸⁶自“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以下二十句，至“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敘事中多寓含

82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頁314。

83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頁332。

84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429。

85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頁85—118。參考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1—22。

86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手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艷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媿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嶮。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嶼。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轉下頁）

議論，如獅子吼，令人髮上指冠，其義多不說破，大抵見於文字之外。故仇兆鰲《杜詩詳注》評此詩“蚩尤塞寒空”一段，稱“上四，見不恤苦寒；下四，譏恣情荒樂”；“彤庭所分帛”段：“上四敘事，下六託諷”；“沉聞內金盤”段：“前八敘事，後四託諷”，⁸⁷ 夾敘夾議，論斷自在其中。

再如《三吏》、《三別》，於杜甫詩史、敘事歌行中，報導征戰不已，天下離亂，家破人亡，民不聊生之實況。杜甫據事直書，徵存一代史事，尤其具體而微。誠如諸家所言：

師氏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兵益急，雖秦之謫戍，無以加也。⁸⁸

盧元昌曰：先生以六族安萬氏，使民有室家之樂。今《新安》無《石壕》遣嫗，《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陣亡之子孫，至(《無家》)戰敗逃難者，又復不免。河北生靈，幾於靡有孑遺矣。⁸⁹

清錢謙益《錢注杜詩》，著重以史證詩；鉤稽歷史，覆按杜詩，所謂“考舊注以正年譜，倣蘇注以立詩譜”。⁹⁰《新安吏》，驅民守東都；《石壕吏》，驅民守河陽；《潼關吏》，築城以備胡。《新婚別》，暮婚而晨別；《垂老別》，垂老而從戎；《無家別》，征人歸鄉而無家。要皆安史亂後之實況，杜甫以新題樂府敘記所見所聞，所感所知，足補正史之缺略。

錢謙益注杜詩之《三吏》、《三別》，於《新安吏》箋注，援引《舊唐書》、《資治

(接上頁)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媿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蒼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頁 268、269、270。

87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270。

88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23。

89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39。

90 杜甫著，錢謙益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1979)，頁 4。

通鑑》、《安祿山事跡》；於《潼關吏》箋注，援引《雍錄》、《元和郡國志》、《哥舒翰傳》；《石壕吏》注則援引《一統志》、《元和郡國志》。明王嗣奭《杜臆》稱：“上數章詩，非親見不能作；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公往來東都，目擊成詩，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淚。”⁹¹ 杜甫身經目擊，比其事而屬其辭，因而以類相從，敘次“相州師潰敗”之史事。排比史事而直書之，而事之是非曲直，人之功過毀譽，自見於言語之外。要之，此即薪傳《左傳》歷史敘事之傳統，於敘事中寓論斷，所謂比事以見義之《春秋》書法也。

（三）微婉顯晦，推見至隱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說《左傳》解釋《春秋》，其例有五，司馬遷以降所謂“義法”說，已胎始於此。《春秋》五例之五，為懲惡而勸善，乃“何以書”之“義”。前三者涉及曲筆諱書，筆者稱為忌諱書寫；與盡而不汙之直書，同屬“如何書”之“法”。曲筆與直書，猶二律悖反，皆絲牽繩貫、脈注綺交於其義。曲筆與直書，蔚為中國敘事傳統之兩大書寫手法，源遠流長，值得關注。晉杜預《春秋序》說曲筆曰：

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例，以示大順，諸所諱辟，譬假許田之類是也。⁹²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三者，為曲筆諱書之手法，與“盡而不汙”之直書，猶鳥之雙翼，相反相成，皆忌諱書寫之常法。典出《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謂《春秋》之書法，措辭簡要，而旨趣顯豁；明載史實，而意蘊含蓄；婉轉曲折，而順理成章。⁹³ 此一曲筆諱書之手法，《左傳》於解釋《春秋》之微辭隱義時，呈現最多。筆者最近完成《〈春秋〉曲筆、直書與〈左傳〉之歷史敘事——以

⁹¹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539。

⁹² 左丘明著，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春秋序》，頁 16—17，總頁 13—14。

⁹³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 年），頁 183—201。

書薨、稱弑之書法為例》；《〈春秋〉曲筆示義與〈左傳〉之比事屬辭——以書滅之書法為例》；《〈春秋〉直書楚滅華夏與〈左傳〉以史傳經——以屬辭比事之書法為例》、《〈春秋〉直書滅華與〈左傳〉資鑑之史觀——以直書華夏相滅、狄吳滅華為例》四文。⁹⁴ 由此可知，曲筆諱書，無疑為《春秋》“如何書”之重要書法。

孔子作《春秋》，於定、哀之際多微辭；司馬遷著《史記》，敘楚漢之爭、漢初以來，尤其武帝時期，“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故亦多曲筆諱書。《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稱：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⁹⁵

春秋定、哀之際，就孔子作《春秋》言，為近代、現代、當代之歷史書寫，其中自多“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於是而有“微婉顯晦”之忌諱書寫。司馬遷身處漢初一統天下之後，情境類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所云“《春秋》推見至隱”，晚唐孟棨(啟)《本事詩》所謂“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指稱之“推見至隱”，要皆指《春秋》書法曲筆諱書之發用。蓋杜甫身陷長安淪陷區，身經目歷安史之亂，猶孔子身處定、哀之際，司馬遷書寫楚漢之爭以來事迹。舉凡近代、現代、當代之歷史，其中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者必多，將如何著墨，方能“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發用微婉顯晦之《春秋》書法，落實主文譎諫之諷諭傳統，講究忌諱書寫之寫作藝術，當不失為明哲保身、兩全其美之策略與法門。

杜甫新題樂府之敘事歌行，世所謂“詩史”者，取材“直書其事”，而措詞技法，則多運化“推見至隱”以敘事，曲筆諱書或為尊者諱，或為諱國惡，堪稱《春秋》書法之絕佳體現。以微婉顯晦之書法品評詩人詩歌者，司馬光評杜甫《春

⁹⁴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年)，頁95—161；頁163—237；頁239—285；頁287—343。

⁹⁵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太史公曰”，頁69，總頁1201。

望》詩，所謂“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⁹⁶“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二句，誠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矣！劉知幾《史通·敘事》所謂“尚簡”、“用晦”，皆曲筆之美學效應。其次，楊萬里《誠齋詩話》論《詩》與《春秋》相表裏，持“微婉顯晦”書法，軒輊劉長卿、陳克、李義山有關唐明皇宮闈之敘事得失。⁹⁷若持微婉顯晦之曲筆書法，觀照杜甫敘事歌行，論說舉例詳明者，莫過於南宋張戒（？—1160）《歲寒堂詩話》所述，如云：

至於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固無與為敵。如放歸鄜州，而云“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昭許歸蓬華”。新婚戍邊，而云“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壯游》云：“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洗兵馬》云“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禮。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⁹⁸

楊太真事，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真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蹟之耶？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專寵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絕美可想也。至於言一時行樂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輦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不待云“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時行樂可喜事，筆端畫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豈終極”，不待云“比翼鳥”、“連理枝”、“此恨綿綿無盡期”，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於言外。題云《哀江頭》，乃子美在賊中時，潛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為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

⁹⁶ 司馬光：《溫公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78。

⁹⁷ 楊萬里：《誠齋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9。

⁹⁸ 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453。

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⁹⁹

張戒《歲寒堂詩話》，徵引杜甫《北征》、《壯游》¹⁰⁰、《洗兵馬》¹⁰¹諸新題樂府敘事歌行，稱“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禮”。又品評商榷唐代詩人吟詠楊貴妃之手法，持杜甫《哀江頭》詩，與白居易《長恨歌》、元稹《連昌宮詞》相比較，以為杜甫所作“詞婉而雅，其義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元白二人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文尾更云：“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

99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頁457。

100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十六《壯遊》：“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嵯峨閭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除道晒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蘄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鶩鶩。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嶽，猛虎啖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懼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字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鷗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凶逆未定，側佇英俊翔。”頁1438~1446。

101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六《洗兵馬》：“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葡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鑿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禁通霄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頁514~519。

美一句”云云，文約而事豐，乃“微而顯，志而晦”之具體表現。試徵引杜甫《哀江頭》詩如下，以資比較：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¹⁰²

杜甫《哀江頭》詩作意，誠如明黃生《杜詩說》所云：“詩意本哀貴妃，不敢斥言，故借江頭行幸處標爲題目耳”。¹⁰³ 杜甫以“昭陽”、“同輦”二句十四字，形象體現楊貴妃之專寵與絕色。不敢斥言，故曲筆諱言太真，但指輦前才人，側筆烘托。張戒推崇“此意尤不可及”，此即捨正面而取旁面之烘雲托月法，是所謂側敘。“翻身”、“一笑”兩句，亦形象靈動，活繪出“一時行樂可喜”之事，果然筆端畫出，宛在目前。誠如歐陽修《六一詩話》所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者。清仇兆鰲《杜詩詳注》亦點出：“苑中生色，佳麗多也。昭陽第一，寵特專也。同輦侍君，愛之篤也。射禽供笑，宮人獻媚也。”總之，敘貴妃遊苑，極寫盛時之樂事。¹⁰⁴“明眸”、“血污”、“清渭”、“去住”四句二十八字，敘死別生離、馬嵬西狩之悲情。張戒特賞“江水江花”一句，以爲“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于言外”。通全詩觀之，遂評爲“詞婉而意微”。

唐劉知幾《史通·敘事》，標榜尙簡、用晦、貴曲之敘事書法，多舉《左傳》敘事爲例。¹⁰⁵ 由此觀之，杜甫作《哀江頭》詩，張戒所謂詞婉，即是劉知幾所云《左

102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哀江頭》，頁 329。

103 黃生：《杜詩說》，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哀江頭》，頁 329。

104 同上，頁 330。

105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第七章《劉知幾〈史通〉及其〈春秋〉〈左傳〉學——兼論詩化之史學觀》，頁 284—297。

傳》敘事之貴曲；而《左傳》敘事之尚簡、用晦，其審美效果即表現在“意微”之特色上。《歲寒堂詩話》總結：“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誠然有見之言。唐劉知幾《史通·敘事》所謂“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¹⁰⁶尚簡、用晦之道，杜甫詩史之敘事有之。

劉知幾《史通·敘事》標榜之“尚簡、用晦”，即是微、婉、顯、晦之《春秋》書法，杜甫薪傳此一書法史法，除了《哀江頭》之外，尚有《丹青引》¹⁰⁷、《贈花卿》、《戲作花卿歌》諸詩，諸家詩評亦多以為“微而顯”、“語句含蓄”。先說杜甫所作《丹青引》，宋許顥《彥周詩話》稱：

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將軍下筆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後說畫玉花驄馬，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此語微而顯，《春秋》法也。¹⁰⁸

許顥《彥周詩話》說詩，以為杜甫《丹青引》超勝蘇軾《妙善師寫御容》詩，主要在《丹青引》能妙用“微而顯”之《春秋》法。若就此言之，則“微而顯”之《春秋》書法，止在辭文簡約，近乎俗所謂簡單而明瞭而已。辭文之修飾，固是

106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六，《敘事》，頁168、173。

107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十三《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駟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頁1147。

108 許顥：《彥周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頁381。

《春秋》書法之形式，然而最可貴者，除了文約事豐之“簡要”外，尚有“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之用晦之道。¹⁰⁹ 杜甫《丹青引》，小中見大，極寫丹青手曹霸之榮枯，以見唐朝一世之盛衰。曹霸之榮華與唐明皇開元天寶之盛世共始終；曹霸之清苦潦倒，與安史之亂皇朝由盛而衰相消息。杜甫《丹青引》之屬辭比事，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切合《史通》所強調之敘事要領。而原始要終，見盛觀衰，其義多歸於資鑑。

黃永武教授發現：杜甫筆下的馬，暗示國勢的盛衰，如《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是。馬又同時縮連先帝的追思，如《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詩：“全詩是以先帝為核心，一人有慶，兆民是賴。綜觀這位畫家的出身，榮遇及晚年的窮困，一身的盛衰就繫於先帝事業的盛衰。”¹¹⁰ 小我的榮枯，繫於大我的盛衰，此自是“舉輕以明重”，舉細小以窺宏大之《春秋》書法體現。作於大歷二年之《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敘寫相隔五十年，時空錯位，先後觀看師徒二人之劍器舞，由師徒之滄桑經歷，自可窺見開元天寶五十年間之治亂盛衰。《春秋》書法，或舉輕以明重，或即細以見大，杜甫敘事歌行有之。

杜甫《贈花卿》¹¹¹、《戲贈花卿歌》，¹¹²以及《麗人行》，¹¹³諸家詩評，或以為“微而顯”，此辭微而義隱；或以為意在言外，可與風雅代興，如：

世人謂杜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

109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六《敘事》，頁168、173。

110 黃永武：《杜甫筆下的馬》，收入《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9），頁194—197。

111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十《戲作花卿歌》：“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緜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鬪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頁844。

112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十，《贈花卿》：“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頁846。

113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二《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盛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匊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厭久未下，鑿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頁156。

句,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遂大掠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當時花卿(金定)跋扈不法,有僭用(天子)禮樂之意。子美所贈,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得聞乎?¹¹⁴

析案:此《麗人行》詩之妙,在於意在言外。……余尤愛……李安溪之論。……李云:歐陽文忠言:“《春秋》之義,痛之深,則詞益隱,子般卒是也。刺之切,則旨益微,《君子偕老》是也。”此詩實與“美目巧笑”、“象揅縵絺”同旨。詩至老杜,乃可與《風》《雅》代興。¹¹⁵

花卿,指花金定,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川民苦之。杜甫爲作《贈花卿》、《戲贈花卿歌》。因“切當時之文而罔褒”,“多忌諱之辭”,故書法出於“微而顯”,運化了“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明楊慎《升庵詩話》稱:“杜公此詩,譏其僭用天子禮樂也,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¹¹⁶此謂含蓄不露,有風人之旨,與《春秋》推見至隱之書法同功。至於郭曾炘《讀杜劄記》品評杜詩《麗人行》,援引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所謂“《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¹¹⁷論證《春秋》與詩相表裏。郭氏援引,稍變其文,言“痛之深,則詞益隱;刺之切,則旨益微”。今考乾隆皇帝御定《唐宋詩醇》,以“微而顯”品評《麗人行》,以爲“託刺微婉,意指遙深”,可以相互發明。要之,微婉顯晦,固《春秋》之教,亦詩歌風雅代興之法門也。

書寫近代、現代、當代史事,容易觸忌犯諱。尤其攸關“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臨文下筆之際,理當再三斟酌權衡。孔子作《春秋》,何以“至定、哀之際

114 陳善:《捫蝨新話》,俞鼎孫、俞經編:《儒學警悟》本(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頁7,總頁210。參考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四,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詩林廣記》前集卷二。

115 郭曾炘:《讀杜劄記》,《麗人行》,頁37。

116 楊慎:《升庵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644。

117 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歐陽忠公文集》卷七三,《全宋文》卷七一八。

則微”？主要因爲“切當世之文而罔褒”，故多出以曲筆諱書。杜甫身當開元、天寶之後，安史之亂之際，敘事傳人自然回歸主文而譎諫之詩學傳統，以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主諷諭美刺，史主勸懲褒貶，同歸而殊途，此又一證。如諸家品評《北征》、《哀江頭》，多提倡曲筆，而用諱言諱書：

唐人詠馬嵬之事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白居易曰……此乃皆言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立言有體，深得爲君諱惡之義。¹¹⁸

《春秋》有三諱：“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穀梁傳》“成公九年”）¹¹⁹唐啖助曰：“蓋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¹²⁰唐人詠馬嵬坡事，或直辭詠寄，略無避隱，如宋洪邁《容齋隨筆》所云。或曲筆諱書，隱約其辭，如上徵引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所言，是所謂“爲尊者諱恥”。如杜甫所作《麗人行》、《哀江頭》、《北征》諸什，誠如宋史繩祖《學齋佔畢》所言：“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¹²¹杜甫《北征》詩優爲之，能爲明皇諱飾，故諸家交相稱美：魏泰所謂“爲君諱惡”；史繩祖所謂“宜諱國惡”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亦援引重說，主張對君后之過惡，皆當曲筆諱書。¹²²再如宋俞文豹《吹劍錄》，由於君君臣臣之政治倫理，故當爲君王諱

118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頁324—325。

119 王熙元：《穀梁范注發微》，頁609—618。

120 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九，錢儀吉《經苑》本（臺北：大通書局，1970），頁1，總頁2471。

121 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一，《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8。

122 胡仔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前集卷十二，《杜陵七》，頁77。

惡,如云:

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曰“知禮”,蓋爲君諱也。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君安驪姬”,蓋爲父隱也。唐天寶之亂,兆于楊貴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征》詩上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哀江頭》詩雖稍述其事,而惻然有《黍離》閔周之意。至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直播其惡于衆,略無忌憚。李太白《上皇西巡歌》,及歌永王璘渡江,亦謂之東巡。……全無君臣之別矣。¹²³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娶妻不取同姓。今魯昭公娶於同姓,故孔子答問曰知禮,所以爲魯君諱恥也。猶晉獻公惑於驪姬,太子申生聲稱“君安驪姬”,所以爲親者諱疾也。生乎當代,對於當朝君王之過惡恥辱,自當“避其名,而遜其辭”,不宜直辭詠寄,略無避隱。否則,將大傷君臣倫理之情誼。俞文豹《吹劍錄》肯定杜甫《北征》、《哀江頭》諸詩之曲筆諱書,批評白居易、元稹之詠楊妃,是“直播其惡於衆,略無忌憚”;而李白詠上皇,及歌永王璘,“全無君臣”上下之倫理。觀宋人論唐代宮闈嬖昵,以爲當宗法《春秋》曲筆諱書之書法,爲較普遍之共識。一般而言,相較於“直辭詠寄,略無避隱”,略勝一籌。諸家品評杜甫樂府新題之敘事歌行,多舉《春秋》曲筆諱書以爲佐證。

由此觀之,杜甫敘事歌行之微婉顯晦,曲筆諱書,固爲《春秋》書法之體現;亦杜甫兌現《祭當陽君文》之信約,對於十三世遠祖杜預“不敢忘本,不敢違仁”之承諾。於是,除“詩是吾家事”之外,結合詩歌、敘事,融鑄經學與文學,而蔚爲家學之薪傳與發用,有如此者。

三、結 論

自晚唐孟棨(啟)《本事詩》,提示杜甫“流離隴蜀”諸作,指目爲“詩史”之

123 俞文豹:《吹劍錄》,程毅中主編:《宋人詩話外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下冊,頁1226。

後，杜詩學者紛紛聚焦於“詩史”之闡發，歷宋元，經明清，至現當代，仍方興未艾。至於所謂“推見至隱”四字，卻大音希聲，未受應有之關注。或視若無睹，或乏人問津，不無遺憾。

“《春秋》推見至隱”，典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杜甫三十歲時，作《祭遠祖當陽君文》，追懷十三世祖杜預“《春秋》主解，稿隸躬親”之貢獻；感慨“嗚呼筆跡，流宕何人？”之遺憾。悲憤之餘，於是有“不敢忘本，不敢違仁”之信誓。由此觀之，杜甫之家學，除“詩是吾家事”以外，杜預之《春秋》書法、《左傳》之歷史敘事，順理成章，亦為家學淵源之主體。杜甫必須能克紹箕裘，肯堂肯構，方稱“不忘本，不違仁”。上述研究視角，學界鮮少關注。筆者擬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詳人之所略，於是草就本文，以就教於方家學者。

屬辭比事，為研究《春秋》書法，探討歷史敘事，以及解讀中國傳統敘事學之法門與要領。杜甫詩史，及其敘事歌行，蔚為敘事傳統與抒情傳統之交融與爭輝。本文只就杜甫詩史與“屬辭比事”之敘事傳統，進行論證。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表現於杜甫之敘事歌行，層面有三：其一，比屬觀義：即原始要終，張本繼末之敘事策略，如《北征》、《草堂》諸詩，以及安史之亂前後所作系列敘事歌行。言事相兼，問對成章者，為《左傳》之歷史敘事方法。杜甫詩如《兵車行》、《哀王孫》、《新安吏》、《潼關吏》、《新婚別》諸什，亦多所運用。《左傳》敘事傳人，長於擬言代言；杜甫詩如《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諸詩，堪稱異曲同工。由此觀之，多薪傳《左傳》歷史敘事之心法。

其二，比事見義：類比、對比相關意象，纂組會通意象以見指義，此孔子《春秋》取義所由之一。杜甫詩史中，身經目歷安史之亂，據事直書，自見美惡者多；洪邁所謂“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者皆是。如《兵車行》、《前出塞》、《後出塞》、《三吏》、《三別》、《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青阪》、《公孫大娘舞劍器行》諸什，排比場景，鋪陳史事，而治亂、興衰、是非、成敗，自見於言外，是其例也。

其三，屬辭示義：連屬辭文，修飾字句，是所謂屬辭，亦孔子《春秋》取義所由之一。杜甫詩史，據事直書之外，曲筆諱書尤為重要之表現藝術。微婉顯晦之書法，曲傳推見至隱之指義，如《北征》、《麗人行》、《哀江頭》、《壯遊》、《洗兵

馬》、《新婚別》、《哀江頭》、《丹青引》、《贈花卿》、《戲贈花卿歌》諸詩，多文約事豐，辭婉而意微，指趣在言語文字之外，可與風雅代興。

杜甫流離隴蜀，所作敘事歌行，《本事詩》所謂“推見至隱，殆無遺事”之詩史，敘事傳人之際，自多《春秋》書法之體現。如屬辭比事，筆削顯義；據事直書，美惡自見；微婉顯晦，推見至隱，其大者焉。杜甫詩史、敘事歌行，所以富含《春秋》書法者，大抵為落實而立之年所作《祭當陽君文》，承諾“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十三世遠祖杜預之《春秋》《左傳》學，遂得以轉化為詩史之書寫策略。於是，在“詩是吾家事”之外，杜甫結合詩歌、敘事，融鑄經學與文學，而蔚為家學之薪傳與發用。

除此之外，杜甫敘事歌行尚牽涉到“義則竊取”之抒情傳統。孔子作《春秋》，稱“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意謂私為，指作者自我之心、性、情、氣、志、意之抒發或表現。敘事歌行之感性者，表現為六義之比興，義在言外。《文史通義·史德》云：“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杜甫敘事歌行有之。理性者，體現其詩史意識，義歸於資鑑。《左傳》成公十四年載《春秋》五例，其五曰懲惡而勸善。此一部分，為杜甫詩史與抒情傳統之關係，由於篇幅所限，未嘗論證。擬另立新篇，他日再議。

(作者：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特聘研究員，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方韜：《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 王熙元：《穀梁范注發微》。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2年。
- 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
- 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史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王運熙：《望海樓筆記》。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孔廣森：《孔檢討公羊通義》。臺北：復興書局，1961年、1972年。
-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司馬光：《溫公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
- 左丘明著，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史繩祖：《學齋佔畢》，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杜甫著，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1980年。
- 杜甫著，錢謙益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1979年。
- 杜甫著，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杜甫著，浦起龍釋：《讀杜心解》。臺北：中央輿地出版社，1970年。
- 沈德潛：《說詩碎語》，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吳汝煜：《史記論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
- 周一平：《司馬遷史學批評及其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 孟棻(啟)：《本事詩》，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胡子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1981年。
-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 范溫:《潛溪詩眼》,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年。
- 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俞文豹:《吹劍錄》,程毅中主編:《宋人詩話外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 班固著,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 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
-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乾隆帝:《御選唐宋詩醇》,《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
- 郭曾炘:《讀杜劄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張忠綱:《杜甫詩話六種校注》。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年。
-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
-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
-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年。
-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年。
- 張高評:修訂重版《左傳之文學價值·張高評解析經史二》。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年。
- 張新科:《史記與中國文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許覲:《彥周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錢儀吉《經苑》本。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
- 陳世驥:《陳世驥文存》。臺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
- 陳國球、王德威:《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
- 黃生著,徐定祥點校:《杜詩說》。合肥:黃山書社,1984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9年。
- 陳善:《捫蝨新話》,俞鼎孫、俞經編:《儒學警悟》。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
- 楊萬里:《誠齋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楊慎:《升庵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葉政欣：《杜預及其春秋左氏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
-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董乃斌編：《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董乃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論稿》。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
- 蔡正孫：《詩林廣記》，蔡振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 蔡啟：《蔡寬夫詩話》，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年。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劉克莊著，王秀梅點校：《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劉師培：《古春秋記事成法攷》，《劉申叔先生遺書》第3冊，《左龔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
- 歐陽修：《歐陽忠公文集》，曾棗莊等主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
-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
- 魏泰：《臨漢隱溪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71年。
-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 論文

- 張伯偉：《中國文學批評的抒情性傳統》，《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頁16—24。
- 張高評：《〈管錐編〉論〈左傳〉之敘事與記言——錢鍾書之〈左傳〉學》，《國學研究》，第15卷（2005年6月），頁351—384。
- 張高評：《〈春秋〉曲筆書滅與〈左傳〉屬辭比事》，《成大中文學報》，第45期（2014年6月），頁18—19。
-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義”在言外——比事見義與〈春秋〉學史研究》，《文與哲》，第25期（2014年12月），頁77—130。
- 張高評：《朱熹之〈春秋〉觀——據實直書與朱子之徵實精神》，《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年，頁353—390。
- 張高評：《文章修辭與〈春秋〉書法》，《中國經學》，第19輯（2016年10月），頁29—30。

張高評：《〈春秋〉〈左傳〉〈史記〉與敘事傳統》，《國文天地》，第33卷第5期(總第389期，2017年10月)，頁16—24。

顏崑陽：《從反思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建構以論“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聚狀結構》，《東華漢學》，第9期(2009年6月)，頁1—47。

龔鵬程：《成體系的戲論：論高友工的抒情傳統》，《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155—190。

Du Fu the Poet-historian,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Chun Qiu*

Chang Kao Ping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he was thirty years old, Du Fu (712 – 770) wrote “A Funeral Oration for My Ancestor, Danyang Jun,” in which he praised his ancestor Du Yu (222 – 285): “Commentating the *Chun Qiu*, / He transcribed it by his own hands. / Alas! His own handwriting, / To whom will it pass on?” He then made a promise: “I dare not forget about my roots, / And dare not violate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Meng Qi of the late Tang commented on Du Fu’s suffering dur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He wandered to the Long and Shu regions and wrote about all of his experience in his poetry. Its hidden meaning may be inferred—perhaps no incident is left unaccounted for. For this reason, he was given a sobriquet of poet-historian.” The “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 in the *Shiji* says, “*Chun Qiu* allows one to infer the message hidden in the most profound text.” Therefore, the reason why Du Fu’s poetry was referred to as “poetry-history” was not only because, as he claims, “poetry is my family’s matter,” but also because of his inheritance of the writing style of *Chun Qiu*. Zhang Xuecheng (1738 – 1801) wrote in his “Discourse on Literature, Presented to Grand Protector”: “Narrative was in fact derived from historiography. Its origin was in word connection and event arrangement in *Chun Qiu*.” This study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roficiency at narrating current events observed in some narrative ballads selected from Du Fu’s works. It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odel method of “word connection and event arrangement” from *Chun Qiu* in its

examination of the writing style of “hidden meaning may be inferred” in Du Fu’s poetry. In its discussion of Du Fu the poet-historian and his method of “word connection and event arrangement,” the essay analyzes three aspects: 1) “word connection and event arrangement” and manifesting the principles by writing method; 2) writing according to facts and thus praise and condemnation will naturally be shown; 3) showing the implicit through a subtle and euphemistic style and “the hidden meaning may be inferred.” It will analyze relevant examples of Du Fu’s works in light of commentaries by scholar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in Du Fu’s poetry.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lyrical tradition, we learn that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Du Fu the poet-historian; “word connection and event arrangement”; narrative tradition; writing style of *Chun Qiu*; lyrical tradition